

# 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

杨馥端<sup>1</sup>, 窦银娣<sup>1,2,3</sup>, 李伯华<sup>1,2,3</sup>, 刘兴月<sup>1</sup>, 刘沛林<sup>2,3,4</sup>

(1.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衡阳 421002; 2. 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 衡阳 421002;  
3. 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衡阳 421002; 4. 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暨  
乡村振兴研究院, 长沙410022)

**摘要：**在城乡要素流动、旅游产业转型以及符号消费转向的综合作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逐渐面临异化和解体困境。作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议题。基于此,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根基,结合符号消费与场域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捞车村为例,通过解构捞车村文化空间在旅游场域转换与符号消费语境下的生产演变逻辑,深入剖析捞车村文化空间异化的外显表征和内隐动因,以此提出文化空间重构再生路径。结果显示:① 物质文化空间:呈现多元文化嵌套的符号拼贴现象,多元行动者通过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营造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混杂的符号化物质文化空间;② 制度文化空间:形成传统治理制度和现代新型制度并置格局,地方政府等根本力量、旅游公司等推动力量、乡风民俗等附加力量促使制度文化空间的契约化;③ 精神文化空间:面临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维分化与隔离,多群体共同实践、多重话语建构、主客凝视互动等导致精神文化空间逐渐脱域化;④ 文化空间重构:根据捞车村文化空间异变的外显表征和内隐动因,从优化空间秩序和重塑符号景观两个维度重构文化空间。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中优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转型发展路径,进而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动力支撑。

**关键词：**传统村落;城乡融合;文化空间生产;场域转换;符号消费;捞车村

DOI: 10.11821/dlyj020220954

## 1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成为突出问题之一<sup>[1]</sup>。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结合,也是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sup>[2]</sup>。由于乡村旅游在促进城乡互动、缓解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旅游开发已逐渐成为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的有效路径。此外,在以符号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传统村落因蕴含独特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其空间价值的挖掘与文化符号的营销成为各类资本竞相追逐的焦点。

收稿日期: 2022-09-06; 录用日期: 2022-12-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15、42271215);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J30062、2022JJ301-00);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11251)

作者简介: 杨馥端(1998-),女,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保护与更新。

E-mail: 907283390@qq.com

通讯作者: 窦银娣(1982-),女,安徽合肥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E-mail: wyzjjzj@163.com

2172-2190 页

随着现代性和流动性力量的强势涌入,传统村落不断经历着地域空间分裂与整合、文化功能分化与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失序与重组<sup>[3]</sup>,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化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真性与自主性,引发符号拼贴化、空间异质化与文脉撕裂化等潜在危机<sup>[4]</sup>。基于此,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助力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发展。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调保护传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及人文环境,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和当代价值。面对新时期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战略需求、乡村旅游驱动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异变的现实背景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导向,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优化转型与价值重构,进而服务于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关于乡村空间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功能主义视角阶段、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和90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阶段<sup>[5]</sup>,新思潮带来的研究范式使传统村落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更加多元,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并逐渐形成了以3S技术、模型测算等定量分析与扎根理论、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分析为研究方法<sup>[6,7]</sup>,以空间生产<sup>[8,9]</sup>、行动者网络<sup>[10,11]</sup>、社会网络<sup>[12,13]</sup>等为理论视角的多维研究框架,研究焦点逐渐由传统村落的物质、经济空间转向社会与文化空间。国内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研究多集中于物质空间,研究主题包括传统村落的形态分布格局<sup>[14]</sup>、时空演变规律<sup>[15]</sup>和空间转型重构<sup>[16]</sup>,研究尺度既有宏观的全国尺度<sup>[17]</sup>,亦有中观的流域、区域、省际尺度<sup>[18,19]</sup>,也有微观的村域尺度<sup>[20]</sup>。随着社会-文化与后现代转向,尤其在新文化地理学带来的新颖视野与多样性话题的影响下<sup>[21]</sup>,逐渐形成了旅游凝视<sup>[22]</sup>、旅游场域更新<sup>[23]</sup>、文化空间生产<sup>[24]</sup>、文化空间治理<sup>[25]</sup>等众多领域的新研究热点。学者们运用整体系统观念和协同“双赢”思维,从人文维度关注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及重构研究,探讨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地方性保护与塑造策略<sup>[26]</sup>、社区增权视角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共享共建共治模式<sup>[27]</sup>、时空阶段与多元主体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转换的建构机理<sup>[28]</sup>等。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研究具有维度综合(时间-空间)、学科综合(跨学科-跨领域)、视角综合(宏观-中观-微观)及方法综合(定性-定量)的特点,已形成有形与无形要素交织、宏观与微观层级并列、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共存的研究图景。学术界虽有涉及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演变与重构研究,但是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逻辑与重构路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不充分。基于城乡融合与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厘清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演变逻辑,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转型重构,亟待理论研究与方法突破上的创新。空间生产理论作为重要的空间分析工具,推动了乡村空间研究范式的转型<sup>[29]</sup>,能够为解构和建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复杂系统的演变机制与优化路径提供新研究视角。因此,本文试图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根基,结合场域转换与符号消费理论构建多角度-多主体-多要素联动、内涵-形式-意义统一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捞车村为例,通过解构捞车村文化空间在场域转换与符号消费背景下的生产演变逻辑,深入剖析旅游发展背后隐藏的空间异化问题与潜在危机,以此针对性地提出捞车村文化空间的重构路径。旨在从理论中深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演变研究,从实践中优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转型重构路径,进而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 2 理论嵌入与框架分析

### 2.1 理论嵌入

**2.1.1 空间生产**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 (Henry Lefebvre) 创立了空间生产理论, 并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基本理论框架, 揭示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要素和力量对空间的重塑。在其理论框架下将空间的生产划分为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与表征空间 (space of representations)<sup>[30]</sup>。Halfacree 认为空间的三重逻辑结构能够解释乡村空间<sup>[31]</sup>,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空间的三元组, 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的空间分别对应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与乡村日常生活。“三元空间辩证法”揭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3个维度是共融、互相作用的, 是一种在真实和想象之间开放与重组的辩证互动关系。作为实用、有效的空间分析工具, 近年来, “三元空间辩证法”被逐渐引用到乡村空间研究。基于“三元空间辩证法”既可将传统村落划分为意识形态空间、表征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维度, 解释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权力与空间变化之间的关系<sup>[32]</sup>; 也可将其划分为物质空间、制度空间和社会空间, 分析传统村落空间的转型过程、特征以及驱动机制<sup>[33]</sup>; 还可划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 用以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sup>[34]</sup>。因此, 空间生产理论不仅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着力点, 更为传统村落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思路<sup>[29]</sup>。运用“空间三元论”研究传统村落文化空间, 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演变逻辑。

**2.1.2 场域转换**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创立了实践社会学, 并首次提出了场域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 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 即主要由资本、惯习和实践构成<sup>[35]</sup>。场域不仅是结构化的建构, 更是一种持续的、可转换的禀性系统。从场域转换的原因来看, 其主要推力为异质场域的冲击, 即旧场域中资本及权力的分配难以满足新场域的发展需求, 所以固有场域中的资本与权力重新组合成为新场域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场域转换的过程来看, 随着时间、空间、环境等客观关系构型的改变, 原有场域的实践空间、行动者的思想、价值观与行为倾向等都会发生大幅度转化。传统村落即为一个场域, 经旅游开发后, 传统村落从“封闭空间”变为“开放空间”再转至为“流动空间”。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企业主导的经济力量、游客主导的消费力量等纷纷涌入传统村落, 各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博弈与资本竞争促进旅游场域转换的同时, 也不断塑造着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演变形态。因此, 用场域转换的视角分析长期稳定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在“权力-资本-惯习”变迁下的生产演变过程, 不仅整合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时间脉络和空间维度, 更有效地讨论了文化空间生产与地方实践的关系, 既是场域理论是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夯实与延展, 也是进一步深化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机制与重构路径的认知与探索。

**2.1.3 符号消费**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在《消费社会》中首次阐释了“符号消费”这一概念, 认为人们消费的本质与事实真相不在于形式上的享用物本身, 而在于享用物所显示的意义<sup>[36]</sup>。符号具有表征功能, 是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形式, “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 表现为可感知的符号; “所指”是符号在人们思维中所能引发的观念。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 而符号消费既是空间生产的动力, 又是社会关系建构的手段, 人们通过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意义。传统村落不但具有使用价值, 还蕴涵着丰富的符号意

义, 在资本和利润驱动下, 传统村落土地和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逐渐成为资本逐利行为的着力点之一。传统村落文化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 生产者通过构建文化符号控制并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 促使旧有文化空间结构迅速瓦解并重构为满足其权利诉求和资本增值需求的新空间形态。当代消费社会的符号化和现代性制度工具打造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表征, 使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差异性和地方性开始消解, 逐渐演变成为符号消费主导的“无地方性”空间。因此, 从文化符号消费视角切入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研究, 加强了对符号消费新语境下文化空间生产实质的细致解读, 既是对偏重宏观的资本、权力与空间生产研究的有力补充, 也能够为研究后现代符号消费控制下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演变与重构问题提供新的透视维度。

## 2.2 研究框架

文化空间是各种文化活动的表征, 兼具文化性、空间性和时间性, 是具有一定传统文化活动周期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sup>[37,38]</sup>。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村落文化的地域投射和表征, 主要以村民的文化活动作为核心内容, 并且是保有相应的形式与内容、现存并使用的场所或地方, 具有地域性、动态性和历史性<sup>[39]</sup>。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既包括有形的文化场所, 也包括无形的文化场所, 是有形与无形要素互相重叠与渗透形成的一个复杂、动态而多元的文化系统。根据表征形态可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进一步划分为物质文化空间、制度文化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3个子系统<sup>[40]</sup>。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 空间实践即感知的空间, 是每一社会构成特有的生产、再生产过程的空间体系, 在传统村落表现为古建筑等物质文化空间景观风貌的产生与变化; 空间表征即构想的空间, 是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等通过专业知识或意识形态进行支配的概念性空间, 即传统村落治理模式、伦理规范等制度文化空间; 表征空间即生活的空间, 是居住者和使用者日常生活实践形成的综合空间, 对应传统村落信仰、仪式等精神文化空间。作为一个社会场域, 传统村落本身存在惯习建构、资源争夺和利益驱逐的互动机制, 旅游开发改变了村落行动者的惯习结构、生活方式和资源共享机会。原有场域逐渐转换为旅游场域, 权力、资本与惯习等成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实践的助推力量,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被表征为不同的形态和形式, 同时也催生了多重异化空间。同时, 在符号消费背景下,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被塑造成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商品, 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符号消费与建构进一步驱动和控制文化空间生产演变的形态和方向。综上, 伴随着旅游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转向,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经历了多元主体各自依循权力、资本、惯习与消费逻辑等展开的既有历时性空间塑造又有共时性意义博弈的生产过程, 并逐渐陷入空间异化和文化失真的困境。基于此, 本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 尝试以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为切入点, 构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图1),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解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在旅游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语境下的生产演变逻辑, 剖析文化空间异化的外显表征与内隐动因, 进而为探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优化重构路径提供指导。

##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概况

捞车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境内, 现辖捞车、惹巴拉、算比、克拉、咱主拉、漩水窝、巴列7个自然寨(图2), 共有477户1908人, 其中土家族占95%, 苗族占3%, 以彭、向、田三大姓为主姓, 是典型的土家族聚居村寨。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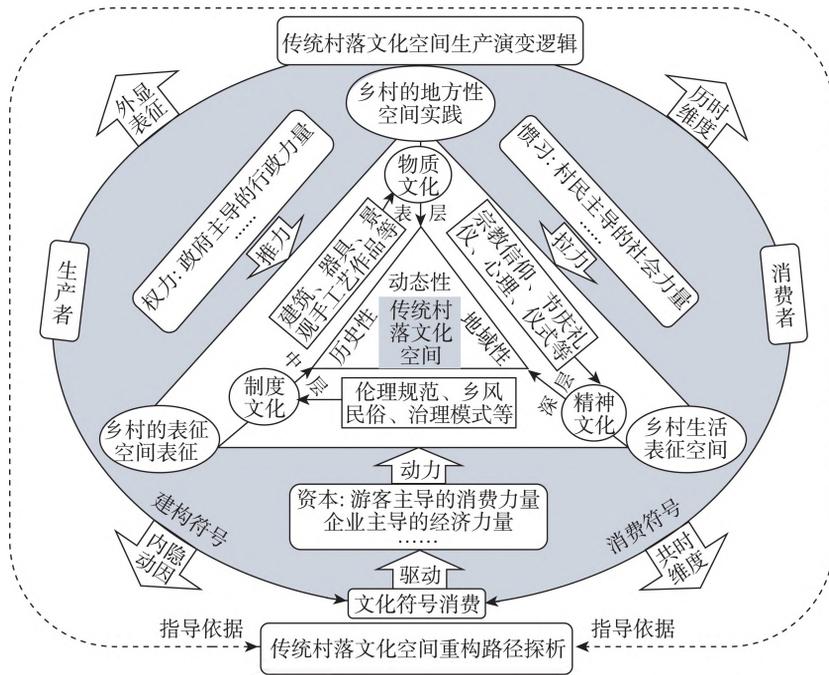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cultural space architecture-evolution logic 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path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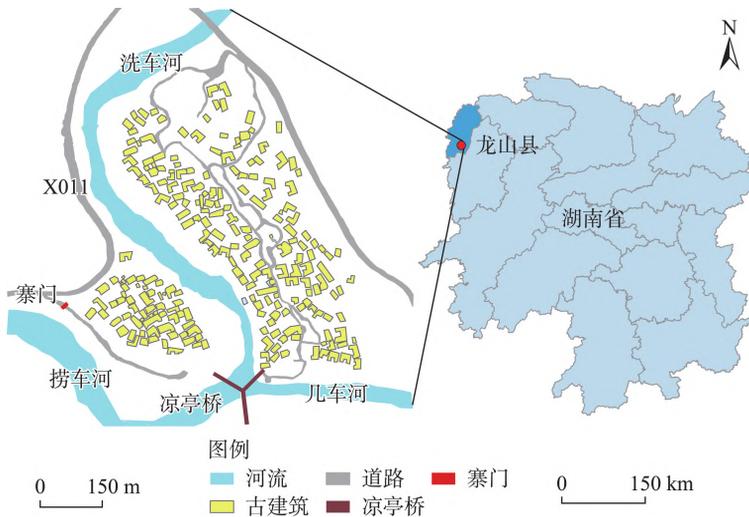


图2 捞车村区位概况

Fig. 2 The overview of the location of Laoche village

车村于2012年被评为全国首批传统村落，村落核心保护区与惹巴拉景区核心旅游区均主要位于捞车寨和惹巴拉寨，整体格局表现为“三山套三河、三河套三寨、一桥通三域”。捞车村保存有土家织锦、摆手舞、茅古斯、梯玛神歌、咚咚喹和打溜子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独具特色的摆手堂、土家风雨桥、冲天楼以及保存最完好的土家民居建筑群，被民俗学家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物馆”“中国土家第一寨”，并先后

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土家织锦之乡”“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作为拥有丰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自2002年发展旅游以来,捞车村在多元主体的投资建设下经历了空间生产与旅游场域转换。从地理空间层面来看,湘西地处偏远、崇山峻岭,湘西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节拍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为舒缓,但是旅游带来流动性与现代性的嵌入,导致捞车村由“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变进程不断加快,然而传统文化挖掘不深、外来文化冲击和多重符号拼贴等原因又致使捞车村逐渐陷入空间异化的困境。因此,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捞车村作为案例,通过分析捞车村的文化空间生产演变逻辑,进而构建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再生路径,能够为中国其他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经验借鉴。

###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团队长期扎根于传统村落研究,先后对湖南省10多个传统村落开展了全面的田野调查,前期已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研究团队于2021年7月20—25日期间前往捞车村进行实地调研,此次调研结束后,研究团队与村支书、民宿老板、古建筑修复公司经理以及少数村民等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各类通讯手段了解村落的发展情况;在团队现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后又于2022年7月13—22日开展为期10天的专题调研。研究数据通过参与式乡村评估(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并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与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获取。① 文本资料:通过走访政府部门收集了惹巴拉景区工程项目设计、规划文本(2017年与2021年景区规划)、旅游活动策划方案与基础资料汇编;捞车村规划资料(村庄规划、保护发展等专项规划)、荣誉称号申报材料与村志等。② 访谈资料:有效受访者样本共计26个,每人访谈时间为30~120分钟,整个访谈过程均在被访谈者同意的前提下录音,采用归纳总结法对调研素材进行事实整理和话语分析,共整理录音文本5万余字;访谈对象包括村委会工作人员、旅游关联工作人员、非遗传承人、村民、新乡贤以及游客等(表1),通过访谈归纳整理出当前村落不同主体对旅游开发的认知、村落文化空间演变的时间脉络及内外动力机制、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及权力分配矛盾等信息。③ 实地考察资料:结合访谈与实地考察等方式,确定捞车村2002年之前、2002—2016年、2016年至今重要道路、公共空间、主

表1 受访者信息及访谈重点

Tab. 1 Interview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 highlights

编号	受访者	受访人数	受访者职业	访谈重点
R1~R13	村民	13	R1(土家织锦国家级传承人) R2(土家织锦省级传承人) R3(咚咚喹、土家族语省级传承人) R4(咚咚喹州级传承人) R5(X民宿老板) R6(S客栈老板) R7(老木匠) R8(土家织锦展示馆员工) R9(L小卖部老板) R10~R13(普通村民)	旅游开发利益冲突、村民惯习结构变化以及话语与心理空间表征
S1~S5	旅游关联工作人员	5	S1(R旅游公司负责人) S2(漂流项目负责人) S3(导游) S4(漂流项目员工) S5(扶贫超市员工)	旅游公司经济收益、招商引资以及主要旅游建设项目情况
G1~G4	行政人员	4	G1~G4(村党支部或村委会工作人员)	旅游发展时间脉络及村落重要空间节点演变情况
T1~T2	游客	2	T1~T2(游客)	文化旅游体验及旅游发展建议
O1~O2	其他	2	O1(古建筑修复公司负责人) O2(F户外探索教育员工)	古建筑修复情况及研学项目策划

要建筑等的演变情况以及旅游开发、田土征收与利用等信息要素,进而构建捞车村不同时间阶段文化空间演变的数据库。最终结合文本资料对访谈数据与观察情况等进行分析与相互佐证,保证了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 4 文化失真与空间异化:捞车村文化空间的演变逻辑

伴随着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多层次-多要素交互流动,捞车村在政府等行政力量、企业等资本力量、游客等消费力量以及村民等社会力量的相互形塑、共生博弈下,逐渐成为行政和资本进行空间价值挖掘以及游客寻找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进行文化符号消费的流动场所。在“时间-空间”二维框架下,捞车村历时性发展经历了“村委自发组织摸索(2002—2016年)-政府他组织力量引导(2016—2020年)-多元组织协同共治(2020年至今)”的旅游场域转换。随着资本增值、符号消费转向,捞车村逐渐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创收的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要素和构成在不断地保留、改造或摒弃中演化出新的面貌,形成具有鲜明旅游市场消费导向的文化场景。具体表现为:①物质文化空间:呈现多元文化嵌套并存的文化拼贴现象,多元行动者通过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营造了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物质文化空间;②制度文化空间:形成传统治理制度和现代新型制度混合并置格局,政府等根本力量、旅游公司等推动力量、乡风民俗等附加力量共同塑造了契约化制度文化空间;③精神文化空间:面临心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三维分化与隔离,多群体共同实践、多重话语建构、主客凝视互动等促使精神文化空间逐渐趋向脱域化(图3)。

### 4.1 空间实践 物质文化空间符号化

空间实践层面,表现为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升级带来捞车村物质文化景观的变化。生产者为了追求剩余价值采取标准化手段生产空间,并通过引导人的消费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对接,使捞车村的物质文化空间逐渐符号化(图4)。旅游的本质特性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同源性,由于捞车村的土家族文化具有稀缺性、差异性和唯一性,生产者通过打造符号景观构建符号消费空间,游客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破译、转译和解读,理解与重构具有历史深度的土家族文化。但是,在多元行动者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中建立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符号拼贴的文化景观空间,导致捞车村在不断地场域转换中趋于去地方化。2002年村委自发组织旅游修复了碾房、榨油房等手工作坊,营造原生气息的同时也向游客展示了原始榨油与碾米的制作工艺,游客通过生产体验实现对乡愁的融入与体悟。新建寨门、摆手堂、冲天楼、凉亭桥等标志性建筑,建筑上的每一个图案和形式都各有所指,每一所指下又有更深层的所指,使捞车村的文化场景建构具有较强的场所感。县政府介入之后为打造“复古怀旧空间”,组织建设了惹巴拉影视城、民俗文化博物馆、龙亭桥等项目。但是,影视城等的修建并未遵循当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而是通过直接借用永顺县土司城和传统院落建筑的普遍布局形式进行旅游符号的同化式生产,使捞车村的地方性在多元文化要素拼贴下逐渐消弭。此外,2017年政府开始落实捞车村居民建房400元/m<sup>2</sup>的补助政策,越来越多的村民为获取更多的旅游收益开始修建房屋用于民宿经营,在攀比心理和趋利行为共同作用下,村民自发组织修建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转角楼,导致捞车村的地域性逐渐流失。“……以前我们这里木房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形式,现在新修的样式花样更多了,很多门、窗户这些都直接去永顺县买现成的,好看是好看,但是没有以前的味道了……”(G4)。随后旅游开发强度逐渐增大,为满足游客需要而生产大量异质化、现代化的文化符号,从而导致捞车村物质文化空间的异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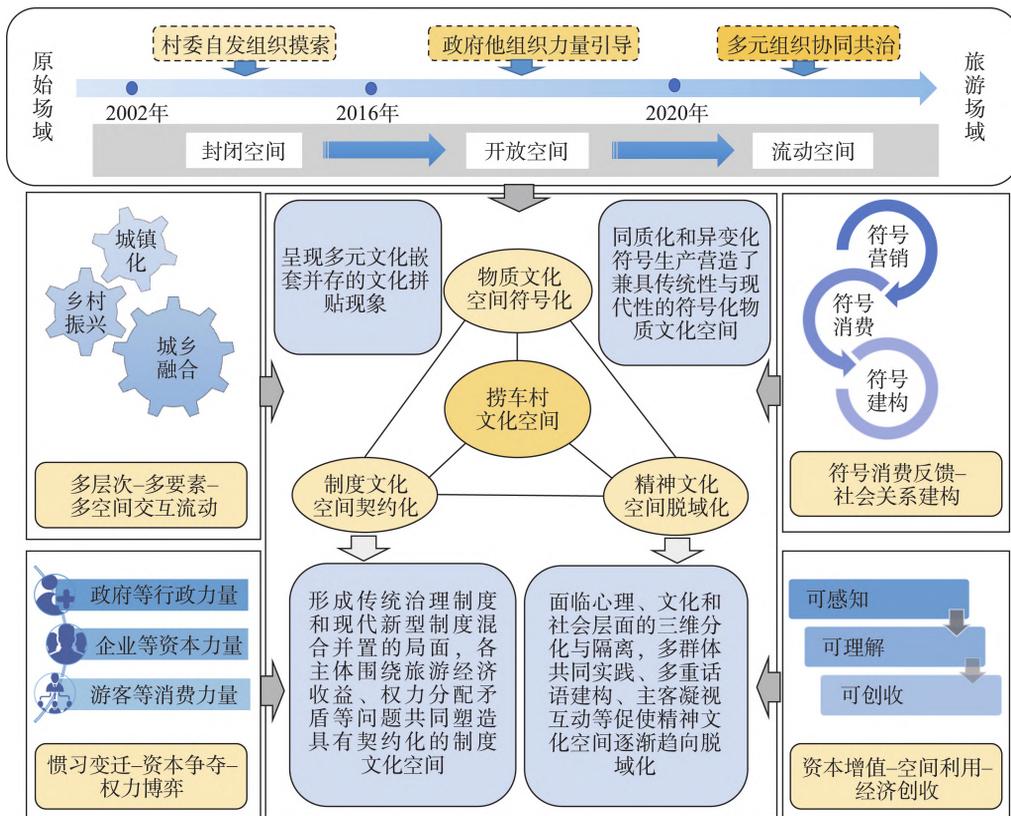


图3 捞车村文化空间生产演变特征

Fig. 3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pace production in Laoche village

生产逐渐明显。2020年R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接管景区，租赁公家和私人住宅20年，分别用来开设风味小吃店、烧仙草奶茶店和扶贫超市，现代符号的植入营造了商业化的消费空间。并通过建设溪流景观带等旅游景观，使捞车村现代化符号特征更为明显。“……环境没有原来那么质朴，溪流景观搞得像城市公园似的……”（R3）。此外，R旅游公司还将“中国土家织锦之乡”这一名片转化为有意义的可消费的符号，以制造和提升消费需求实现资本增值。“……我们主要宣扬土家族文化，吸引研学和夏令营学生过来学习传统文化，有很多学生团队专门过来学（土家）织锦……”（S1）。总而言之，文化符号构建一定意义上能够强化旅游地的竞争力，增强其参与对外交流、市场竞争、文化展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是，由于缺乏对捞车村丰厚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物质文化空间符号构造仍停留在较为表面的视觉形式层面，并且在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中捞车村逐渐演变成消费文化控制下的多元文化拼贴的“符号拼图”，因而如何重构捞车村物质文化空间值得进一步深思。

#### 4.2 空间表征 制度文化空间契约化

空间表征层面，旅游场域转换使捞车村的传统治理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显现为利益争夺下的传统村落制度变迁，不同利益主体通过竞合获取村落发展的主导权，制定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的同时，也清晰界定了捞车村社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边界。围绕旅游经济收益矛盾、权利分配矛盾等问题，行政力量和投资方引导了契约化制度设计，并在内生家族制度、村规民约和外来制度的共同干预下，逐渐形成传统制度和现代新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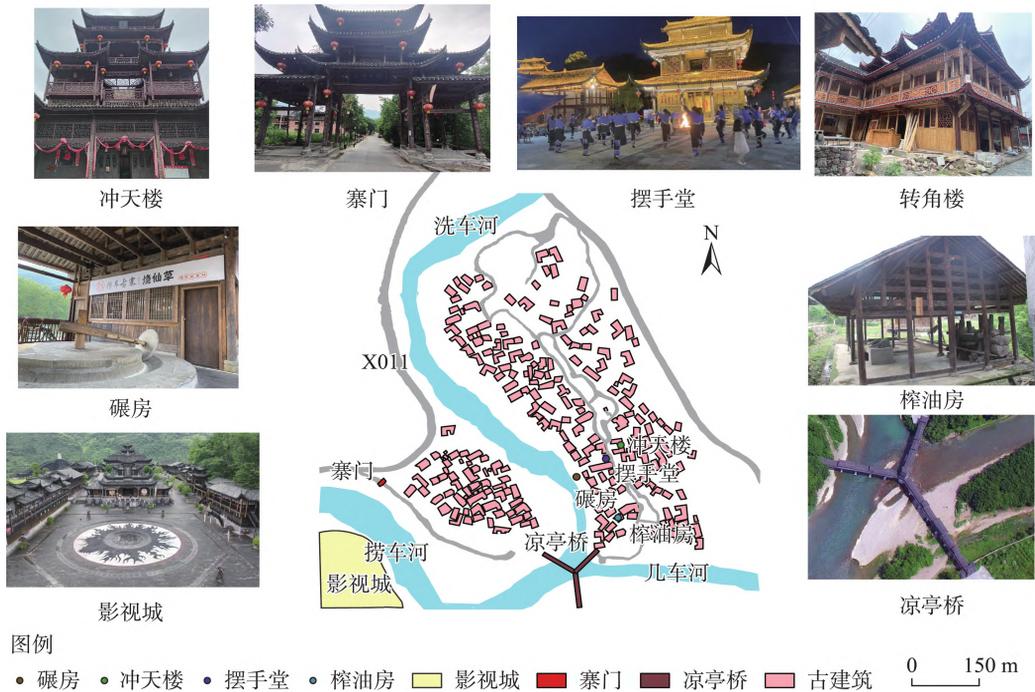


图4 物质文化空间符号化布局

Fig. 4 The symbolic layout of material cultural space

注：冲天楼、寨门来源于2022年7月作者自摄；摆手堂、转角楼、碾房、榨油房来源于2021年7月作者自摄；凉亭桥、影视城来源于龙山县文旅局。

度并置的格局（图5）。2002年为村委会自组织的旅游萌芽阶段，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较少，依靠原始淳朴的乡风民俗治理村落。“……那时候（书记）就说搞旅游必须要把路给修起来，修路要占用百姓的地，村里面没有补贴，（但是）老百姓都很支持……”（G3）。此外，作为家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在亲缘关系上成为村落较早的协调力量，由此形成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模式。“……一般我们向家有事都会先去找向氏比较有声望的那个人，因为他有能力嘛，大家都默认找他……”（R11）。随着外来文化和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渗入，捞车村于2015年经过审核认证，正式注册“腾讯为村”公众号，命名为“为村-湖南湘西惹巴拉村”，通过“互联网+”的形式管理村务。目前已有223位村民经过认证加入“为村”，在公众号内查看村内党务、村务、办理事项以及货物、供求信息、便民通讯录等信息。此外，2016年捞车村村委针对村风民俗、美丽乡村、社会治安、消防安全、邻里关系、婚姻家庭和国土规划等制定22条款，村规民约经由村民大会谈论决议应运而生，进一步规范了村落的治理制度。但是资本的逐利化经营使原住民与旅游公司的收益分配矛盾逐渐显现，“……现在搞旅游就是老百姓收益不高，公司想什么都自己来抓，老百姓也有反对的声音……”（R9）。2020年R旅游公司正式接管景区，捞车村村委会与R旅游公司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吸收制度外显性力量，制定“政府主导、公司营运、集体协管、村民参与”的模式运作。拟定政府负责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利用共享机制，企业负责组织实施易地搬迁和旅游扶贫、民族文化遗产等工作，村集体负责建立村民集体议事制度，重新建设村落生产经营秩序，但是村民仍未获得较多话语权，村民与旅游公司的深层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捞



图5 制度文化空间契约化

Fig. 5 The contractu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cultural space

车村治理制度围绕旅游经济收益、权利分配矛盾等问题制定，伴随着控制旅游产业运营而形成了契约化制度文化空间，投资方在捞车村空间表征上占据着主要的话语权，村民只能在主动和被动中调整日常生活方式和自身行动策略。未来捞车村制度文化空间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协调利益与权利纠纷，进一步提高弱势者的话语权。

#### 4.3 表征空间 精神文化空间脱域化

在表征空间层面，多元主体的介入改变了原始场域的空间秩序及行为逻辑，多元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不断重组社会关系和占领空间权属，导致传统村落精神文化空间逐渐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脱离。捞车村的精神文化根植于村落共同体，通过宗教信仰、节庆礼仪、仪式活动与社会往来等体现。旅游开发带动捞车村场域转换的同时，也促使了心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三维分化与隔离。在流动性塑造中发生社会交往、行为模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惯习结构变化，蕴含着深刻的微观社会分层、文化变异再造以及公共资源权属的争夺现象（图6）。摆手堂是土家族集体性公共活动空间，是土家族人祭祀先祖、跳摆手舞与茅古斯、庆祝丰收的场所，但是2020年R旅游公司正式接管景区之后，引发各行动者对公共空间和地方主体性的争夺。村委会自组织期间，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土家族文化氛围浓厚。“……那时候村里自己搞（旅游）的时候，七、八十多岁的老人都去摆手堂唱歌跳舞……”（G1）。但是，R旅游公司接管之后，村民归属感的丧失造成地理空间区隔和心理空间区隔，逐渐处于弱权或失权状态并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以前我们晚饭后都在这里（摆手堂）跳舞，但是现在在公司接管了之后又是政府又是公司，大家就觉得不是自己的地盘了，也有好多矛盾在里面……”（S5）。村落秩序与村民惯习结构在资本逐利中逐渐打破，社会关系网络也随着凉亭桥的修建与旅游发展逐渐发生维系、渐变与分层。未修建凉亭桥之前，寨子之间的往来仅靠拉拉渡，由于交通不方便，寨子之间来往交流相对较少，家族之间的交流较多，“亲只三代，族以万年”的观念从根本上建构和再构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然而发展旅游之后，传统伦理规范让位于个人利益追逐，维系乡村共同体意识和乡土情感的传统民风逐渐隐性化，社会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原本稳健坚韧的情感联结逐渐裂变，伦理秩序也在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冲突中日渐式微。“……以前家族、亲戚间交往多，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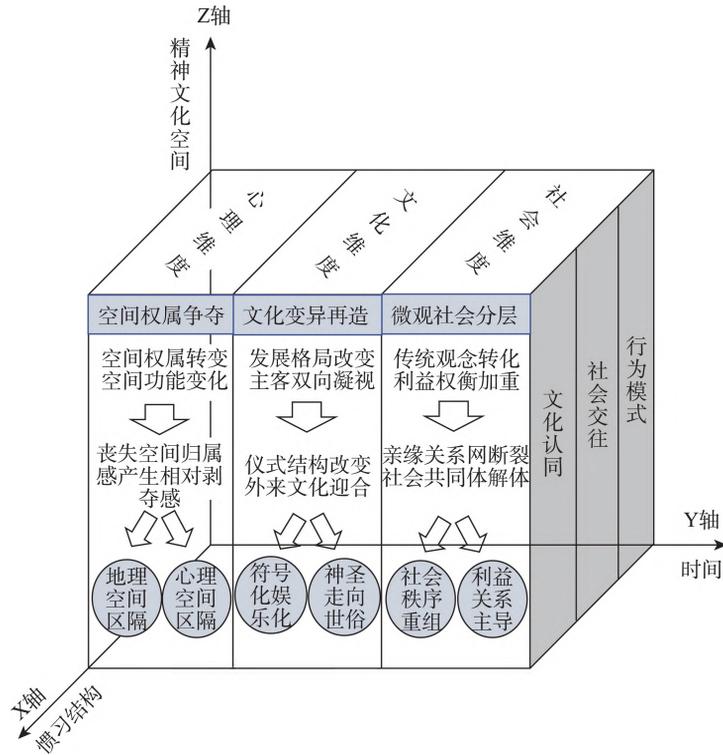


图6 精神文化空间脱域化

Fig 6 The delocalization of spiritual cultural space

在大家都争着搞旅游，有利益关系的（人）往来更多了……”（S2）。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渗透，民俗表演逐渐疏离了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消费逻辑取代生产逻辑，从而使精神文化空间在旅游场域转换中发生了变异。“……以前村民大家一起出表演节目，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现在公司请编导老师、导演之类的，编排的表演节目肯定不是土家族原汁原味的……”（G1）。在地适应、外来文化磨合等使传统仪式的原初结构发生了文化调适，传统神圣的梯玛神歌、哭嫁习俗等的存在方式和价值逐渐发生变化。梯玛神歌充分体现了灵魂观与人神关系的建构，但是商业化开发使梯玛神歌逐渐转向娱乐化和符号化，从神圣走向世俗。此外，舍巴日、油菜花节、花朝节、长桌宴、土家山歌大赛等大型旅游活动的召开打破了原有文化发展格局，村民在游客主观想象的凝视下主动关注与迎合外来文化，并通过改变自身文化以满足游客的旅游欲求。因此，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维分化与隔离，不仅折射了捞车村精神文化空间复杂问题的交互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捞车村文化空间亟待解决的现代性重构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与重塑捞车村文化空间。

### 5 价值回归与意义建构: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

通过分析捞车村文化空间在旅游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语境下的生产演变逻辑，揭示了捞车村在旅游裹挟的流动性与现代性胁迫和资本与权力的双重扰动下，面临物质文化空间符号化、制度文化空间契约化、精神文化空间脱域化等现实问题和潜在危机。其中

景观符号异化是捞车村文化空间的主要外显表征, 资本、政策和惯习的变迁、相互博弈与利益竞争引发村落秩序失衡, 是造成捞车村文化空间符号化、契约化和脱域化等问题的主要内隐动因。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 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sup>[41]</sup>。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风貌完整性、活态性和原真性, 实现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调适, 成为捞车村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对新时期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宏观战略需求以及传统村落发展多元价值目标导向, 优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重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运转逻辑, 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转型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 从破解捞车村文化空间现存及潜在问题出发, 依据捞车村文化空间异变的表征和动因, 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基础、以文化遗产旅游为依托、以文化景观基因为指引, 从空间秩序优化与符号景观重塑两维度重构捞车村文化空间(图7)。

### 5.1 优化空间秩序, 调适权力资本结构

资本力量和行政力量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和信息集聚优势, 因而在旅游场域中占据主导位置, 控制着捞车村文化空间生产演变的方向。外部力量的介入不断侵蚀村落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行为法则和规则体系, 作为内生力量的村民自下而上地抵制外部力量, 导致捞车村文化空间逐渐产生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心理空间与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分化、隔离和异变。因此, 消解捞车村文化空间契约化、脱域化等问题困境, 需要重构村落空间秩序, 进一步优化旅游场域的资本、权力和惯习结构, 在资本与资源介入等方面科学布局、均衡配置, 协调好村民、企业和政府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① 资源整合与资本调适, 形成多元化投入-多模式并举-多主体协作格局: 招商引资目前仍是捞车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 作为外部嵌入力量的经济资本将会源源不断进入捞车村, 制定管理模式及谁投资、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等政策的同时, 需要严格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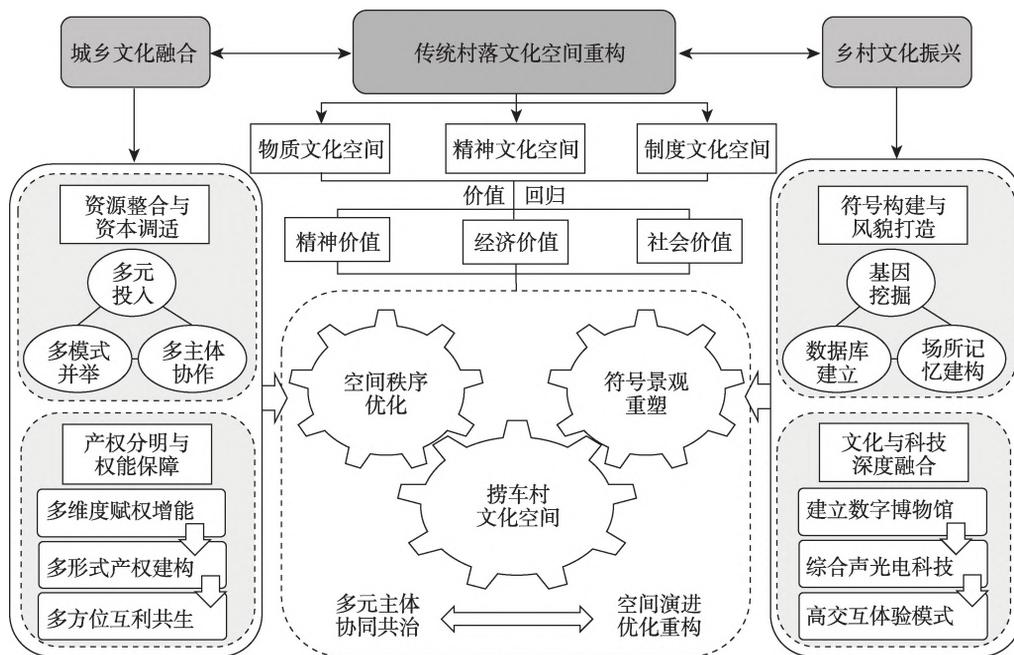


图7 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

Fig. 7 The path of cult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Laoche village

照“政府主导、公司经营、集体协管、村民参与”模式运作,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充分平衡与制约政府重点扶持项目和外来投资集团在捞车村文旅发展格局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创新政府-企业-村民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化解村民与政府、公司之间的利益纠纷。例如:R旅游公司以土家文化为依托主推研学旅行项目,外来研学公司作为投资商介入时需避免融资建设导向、旅游浅层开发、开发商单边主导等问题,还应鼓励村民积极开设民宿、餐饮并与公司合作签约,拓展村民的经济增收渠道。② 产权分明与权能保障,引导多维度赋权增能-多形式产权建构-多方位互利共生逻辑:村民与政府、企业的地位差距使其难以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无力拒绝对于公共空间等的不合理控制和占有,只能在被动中接受和执行。因此,需要加强村民“政治、经济、心理、社会”等多维度的赋权增能,创新性地建构“地役权”<sup>[42]</sup>、“旅游吸引物权”<sup>[43]</sup>等产权制度,使捞车村的增权工具不断精细化、可操作化,从而提升与强化原住民作为促进在地性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和话语权。例如:捞车村摆手堂、冲天楼、凉亭桥等公共空间在承担旅游功能之前主要为村民日常行为活动的公共场所,因此,在开发和利用时需充分考虑村集体的发展意愿并相应地增加服务村民的公共附加功能,以此消除和缓解村民在心理上和地理空间上的区隔。总之,资本与行政将引领未来捞车村文化空间生产演变趋势,只有协调好村民与外来主体之间的权利占有与利益分配问题,进一步提高村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文化资源保护、旅游经营管理、土地权属制定等活动的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现捞车村文化空间在新时代中创造性转换、创造性深化与创造性活化。

## 5.2 重塑符号景观,营造地域文化场景

符号具有自我强化和对外传播的双重功能,能够强化村民对于地方资源的认知与地方文化的认同,此外,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符号还能强化地方资源特征、增强资源参与对外交流以及进行文化展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然而,捞车村文化空间在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中逐渐演化成多元文化杂糅的符号拼图,隐形地消解着捞车村的地域性。因此,需要构建具有地方性与差异性的文化空间,化解捞车村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焦灼对峙,使捞车村由具象空间升华为文化意义上的情感空间。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色是活化的,不仅是符号的简单表征,地域符号的营建需要实现空间基因的在地性认知转变<sup>[44]</sup>,避免注重物质层面的模式化构建而忽视地域文化的精神阐发。但是,一味地强调传统文化符号,以“自塑”为中心,就难以形成文化共鸣,也需要通过结合现代化技术与形式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与完善。文化景观基因是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文化因子,它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sup>[45]</sup>。文化景观基因对传统村落景观风貌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构成传统村落空间意象的关键因素,村落的文化景观基因是地方认同形成的潜在依托。因此,在捞车村景观风貌营造中应充分融入文化景观基因,使捞车村的物质文化空间重塑更具独特的地方风韵和鲜明的土家族文化符号。① 景观基因挖掘,地方记忆空间再构造:通过充分挖掘捞车村的文化景观基因,总结归纳捞车村的建筑基因(民居建筑与公共建筑)、布局基因(形态结构)、文化基因(图腾、习俗与信仰等)、环境基因(河流与地形等)并将其置于原生文化语境中进行解析。将景观基因与符号学、GIS技术结合,从符号哲学的视角系统地分析捞车村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通过构建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特征、分类和相应表达方法的数据库<sup>[46]</sup>,用以指导捞车村物质文化空间的营建与有机更新。例如:解构摆手堂遗址、古祭坛、古村巷、古码头、古油坊、古碾房、转角楼民居等土家族标志性建筑,总结建筑形制、雕刻技艺、彩绘形式、布局结构等特征,依据土家传统元素建构具有较强场所感和地方记忆的物质文化空间。

② 现代技术植入,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重塑文化传播方式, 从而抢占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通过建立数字博物馆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还原捞车村历史场景, 用以保留集体记忆并提升非物质文化对外传播的广度、精度与速度。其次, 综合声光电科技进行非遗演艺, 将非物质文化符号进行实景具象表征, 开发游客全方位和多感官高交互的沉浸式、代入式体验模式, 深化游客具身体验和情感投入。使摆手舞、咚咚喹、茅古斯等民俗演艺; 土家山歌、哭嫁等婚俗姻习; 拜大神、梯玛神歌等土家祭祀以及花朝节、舍巴节等岁时节会更加震撼和富有特色。通过营造具有地方性的符号景观, 使捞车村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城乡融合背景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 6 结论与讨论

### 6.1 结论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背景下, 传统村落经历了旅游场域转换与空间生产实践, 面临空间异化与文化失真等潜在危机。作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议题。基于空间生产、符号消费与场域理论, 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 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捞车村为例, 通过解构捞车村文化空间在符号消费与旅游场域转换背景下的生产演变逻辑, 深入剖析其面临的问题现状和潜在危机, 以此针对性地构建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 物质文化空间符号化: 为了追求剩余价值采取符号化、标准化手段生产捞车村文化空间, 生产主体对捞车村物质文化景观改造的关注点逐渐由工艺价值到经济价值再到文化的符号与消费价值方向演变, 并通过同化式和异变化符号生产, 使捞车村物质文化空间逐渐演变成消费文化控制下的多元符号拼贴的“符号拼图”。

(2) 制度文化空间契约化: 围绕旅游经济收益矛盾、权利分配矛盾等问题, 村落引导了契约化制度设计, 并且在内生家族制度、村规民约和外来文化制度的共同干预下, 逐渐形成了传统制度和现代新型制度并置的格局。

(3) 精神文化空间脱域化: 旅游开发在带动捞车村进行场域转换的同时, 也促使了捞车村心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三维分化与隔离, 在流动性塑造中发生村民社会交往、行为模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惯习结构变化。多群体共同实践、多重话语建构、主客凝视互动等促使捞车村精神文化空间逐渐脱域化。

(4) 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 从破解捞车村文化空间现存及潜在问题, 优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结构与重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逻辑出发, 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基础、以文化遗产旅游为依托、以文化景观基因为指引, 从重塑符号景观与优化空间秩序两维度构建捞车村文化空间重构路径。

### 6.2 讨论

新时代城乡融合不仅是乡村物质空间形态的转变, 更是社会、文化等多维空间秩序的转变。因此,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城乡地域空间的高效利用与价值流通, 也是文化空间的转型重构与创新传承。传统村落在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进行了多层次、多空间流动, 尤其在旅游要素的介入下, 传统村落逐渐从封闭空间转向流动空间, 引发文化空间的多维嬗变与重构。因此, 如何剖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在旅游发展语境下异质性生产演变的逻辑与规律, 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产业经济发展平衡, 促进村落权利赋予、价

值流向、主体博弈以及资源重组等有序开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到达新高度的重要突破。

本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并以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为切入点,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分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演变逻辑的外显表征与内隐动因,通过剖析捞车村在旅游场域转换与符号消费转向下文化空间的异变问题现状,构建了捞车村文化空间优化重构路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文化空间演变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因此,调研内容难以涵盖旅游发展语境下捞车村文化空间演变的所有问题,难免存在理论融合不深入、文化空间生产演变特征分析不透彻、空间重构路径不健全等问题。此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一个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压缩了大量的时空关系,集不同时间、空间要素于一体的复杂综合体。虽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运用空间生产理论研究乡村空间,但多以单一视角分析乡村空间生产机制。本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从场域转换、符号消费等多维视角切入,如同透过棱镜分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在旅游发展语境下的生产演变特征,能够从历时性、共时性和空间性等多维角度窥见其中的权力博弈、关系变迁等逻辑。但是该研究目前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也是本研究团队需要努力突破的方向,同时也期望有更多的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关注旅游场域转换和符号消费转向下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研究。本研究团队未来将继续深入剖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的异质性规律与内在机理,进一步强化方法创新和系统集成,运用GIS技术等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模拟与可视化表达等。深化空间生产与场域理论、符号消费以及景观基因理论的融合体系,完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转型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探索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动力支撑。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专业意见与付出的时间精力,尤其是对文章逻辑结构的梳理、重构路径的完善等方面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匪浅。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DOI: 10.11821/dlxb202006002.
- [2] Ye C, Liu Z.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Multi-scale practice. Science Bulletin, 2020, 65(10): 778-780. DOI: 10.1016/j.scib.2020.02.021.
- [3] 陆林, 陈慧峰, 符琳蓉.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地理科学, 2022, 42(5): 874-884. [Lu lin, Chen Hui Feng, Fu Linro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functio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Xixinan Village, Huangshan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874-884.]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5.013.
- [4]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 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33-249.] DOI: 10.11821/dlyj201802001.
- [5] 王丹, 刘祖云.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2): 1991-2002. [Wang Dan, Liu Zuyun.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ural space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12): 1991-2002.] DOI: 10.18306/dlkxjz.2019.12.014.
- [6] Wang Y, Liang C, Li J. Detecting village-level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 GIS and HLM method. Growth and Change, 2019, 50(1): 222-246. DOI: 10.1111/grow.12275.
- [7] Geravandi S, Papzan A, Afsharzadeh N. Modeling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using grounded theory (Case-study: Sharveineh Village, javanroud township). Journal of Housing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12, 30(136): 67-78.

- DOI: 10.7763/LNSE.2013.V1.54.
- [8] Binnie J, Skeggs B. Cosmopolitan knowledg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exualized space: Manchester's gay villag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52(1): 39-61.
- [9] Frisvoll S. Power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s transformed by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4): 447-457. DOI: 10.1016/j.jrurstud.2012.06.001.
- [10] Prasetyo E B, Ekomadyo A S. The conception of actor network in Jekekong Art and Culture Village of Bandung Regency. *ARTEKS: Jurnal Teknik Arsitektur*, 2021, 6(1): 5-12. DOI: 10.30822/arteks.v6i1.286.
- [11] Rachman A F, Mustika A. Cultural tourism in Naga Village, We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an actor network theory approach)//*Proceedings of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 73-81.
- [12] Hyon R, Youm Y, Kim J, et al. Similarity in functional brain connectivity at rest predicts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in the social network of an entire vill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117(52): 33149-33160. DOI:10.1073/pnas.2013606117.
- [13] Firuozpoor M, Erfanzadeh R, Ghorbani M, et 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scheme of social relation among rangeland stakeholders (Case study: Takor village, Noor). *Rangeland*, 2016, 9(3): 244-254.
- [14] 李伯华, 徐崇丽, 郑始年, 等. 基于图式语言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以湘西南侗为例. *地理科学*, 2020, 40(11): 1784-1794. [Li Buohua, Xu Chongli, Zheng Shinian, et al.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based on pattern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Dong Area in Xiangxi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1): 1784-1794.] DOI:10.13249/j.cnki.sgs.2020.11.003.
- [15] 邓运员, 付翔翔, 郑文武, 等.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特征、测度与归因. *地理研究*, 2021, 40(10): 2722-2742. [Deng Yunyuan, Fu Xiangxiang, Zheng Wenwu, et al. Representation, measurement and attribution of spatial ord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0): 2722- 2742.] DOI: 10.11821/dlyj020210651.
- [16] 李伯华, 周鑫, 刘沛林, 等.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地理科学*, 2018, 38(8): 1310-1318. [Li Bo-hua, Zhou Xin, Liu Peilin, et 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Zhangguying Village in urban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8): 1310-1318.] DOI:10.13249/j.cnki.sgs.2018.08.013.
- [17] 陈慧灵, 徐建斌, 杨文越, 等. 中国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3156-3169. [Chen Huiling, Xu Jianbin, Yang Wenyue, et al. Study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2): 3156-3169.] DOI: 10.31497/zrzyxb.20211211.
- [18] 王培家, 章锦河, 孙枫, 等. 中国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经济地理*, 2021, 41(9): 204-213. [Wang Peijia, Zhang Jinhe, Sun Fen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9): 204-213.] DOI:10.15957/j.cnki.jjdl.2021.09.021.
- [19] 李孜沫.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 *经济地理*, 2019, 39(2): 207-214, 231. [Li Zimo.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2): 207-214, 231.] DOI:10.15957/j.cnki.jjdl.2019.02.025.
- [20] 李伯华, 杨馥端, 窦银娣.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 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地理研究*, 2022, 41(5): 1407-1421. [Li Buohua, Yang Fudian, Dou Yindi.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pat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5): 1407-1421.] DOI: 10.11821/dlyj020210368.
- [21] 钱俊希, 朱竑.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地理研究*, 2015, 34(3): 422-436. [Qian Junxi, Zhu Hong.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22-436.] DOI: 10.11821/dlyj201503003.
- [22] 汪天颖, 陆林, 路幸福. 徽州村落旅游中游客及东道主的凝视行为. *旅游学刊*, 2015, 30(4): 23-32. [Wang Tianying, Lu Lin, Lu Xingfu. The behavior of tourists and hosts by gazing the Huizhou Villages. *Tourism Tribune*, 2015, 30(4): 23-3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5.04.003.
- [23] 周坤, 王进. 场域织补: 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 *人文地理*, 2020, 35(4): 17-22. [Zhou Kun, Wang Jin. Field Weaving: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renew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tourism villages. *Human Geography*, 2020, 35(4): 17-22.]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4.003.
- [24] 孔翔, 吴栋, 张纪娴.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基于苏州东山陆巷古村的调研.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6): 156-165. [Kong Xiang, Wu Dong, Zhang Jixian. The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mod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influence: Based on field work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in Dongshan, Suzhou.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9, 28(6): 156-165.]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9.06.2019064.

- [25] 孙九霞.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遗产与空间治理:“文化遗产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地理研究, 2019, 38(6): 1283-1289. [Sun Jiuxia.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283-1289.] DOI: 10.11821/dlyj020190425.
- [26] 翟洲燕, 李同昇, 常芳, 等. 传统村落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性响应机理. 人文地理, 2017, 32(4): 30-36. [Zhai Zhouyan, Li Tongsheng, Chang Fang, et al. The cultural studies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coordinate response mechanism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uman Geography, 2017, 32(4): 30-36.]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4.005.
- [27] 陈新新, 李伯华, 窦银娣, 等.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惹巴拉村寨为例. 热带地理, 2022, 42(1): 100-112. [Chen Xinxin, Li Bohua, Dou Yindi, et al.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i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Rebara Village.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 100-112.]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16.
- [28] 方远平, 易颖, 毕斗斗. 传承与嬗变: 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318-2330. [Fang Yuanping, Yi Ying, Bi Doudou.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318-2330.] DOI: 10.11821/dlyj201811015.
- [29] 黄剑锋, 陆林.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 基于空间涌现性的空间研究新范式. 地理科学, 2015, 35(1): 47-55. [Huang Jianfeng, Lu Lin.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in tourism destin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A new paradigm of space based on emergence of spa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 47-55.] DOI: 10.13249/j.cnki.sgs.2015.01.006.
- [30]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刘怀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19. [Henry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Liu Huaiy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1-19.]
- [31] Halfacree K.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 In: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6: 44-62.
- [32] Ye C, Ma X, Gao Y, et al. The lost countrysid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angwan village in Shanghai.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 98: 102137.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0.102137.
- [33] 陈晓华, 黄永燕, 王锈贤.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 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热带地理, 2022, 42(1): 78-86. [Chen Xiaohua, Huang Yongyan, Wang Xiuxia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tia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Maihuayucun Village in Huangshan City.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 78-86.]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25.
- [34] 董宝玲, 白凯, 陈永红.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热带地理, 2022, 42(1): 87-99. [Dong Baoling, Bai Kai, Chen Yonghong. Re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in ethnic villages under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A case study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Tropical Geography, 2022, 42(1): 87-99.]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21.
- [35] 皮埃尔·布尔迪厄, 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 李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4-19. [Bourdieu P, Wacquant L.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Li Meng, Li 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14-19.]
- [36]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刘成富, 全志钢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Jean Baudrillard. La société de Consumption. Translated by Liu Chengfu, Quan Zhig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7]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 2005-03-26.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safeguarding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 2005-03-26.]
- [38] 向云驹. 论“文化空间”.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81-88. [Xiang Yunju. On the Culture of Space.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3): 81-88.] DOI: 10.15970/j.cnki.1005-8575.2008.03.018.
- [39] 余压芳, 庞梦来, 张桦. 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研究综述.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2): 74-78. [Yu Yafang, Pang Menglai, Zhang Hua. Review of the cultural spa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China.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9, 40(12): 74-78.] DOI: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12.012.
- [40] 李亮.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 2021(6): 142-152, 171. [Li Liang. Research on th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2021(6): 142-152, 171.]
- [41]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47. [Bao Yaming. Modern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3: 47.]
- [42] 王维艳. 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权能及其空间正义实现路径: 地役权视角下的多案例透析. 人文地理, 2018, 33(5): 152-160. [Wang Weiyan. The approach to realize space reproduction power and space justice for tourist areas: Deep

- analysis on multiple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ement. *Human Geography*, 2018, 33(5): 152-160.]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8.05.018.
- [43] 保继刚, 杨兵. 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 以“阿者科计划”减贫试验为例. *旅游学刊*, 2022, 37(1): 18-31. [Bao Jigang, Yang B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rights to tourist attractions" (RTA) in "Azheke Plan": A field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 18-31.]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1.008.
- [44] 段进, 殷铭, 陶岸君, 等. “在地性”保护: 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的认知转向、实施路径和制度建议. *城市规划学刊*, 2021(2): 25-32. [Duan Jin, Yin Ming, Tao Anjun, et al. Localized preser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 rural settlements: Perspective shift,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2): 25-32.] DOI:10.16361/j.upf.202102005.
- [45] 刘沛林. 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24(4): 1-8. [Liu Peilin.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sight identific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cultural landscape. *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3, 24(4): 1-8.] DOI:10.13914/j.cnki.cn43-1453/z.2003.04.001.
- [46] 胡最, 邓运员, 刘沛林, 等.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 *地理学报*, 2020, 75(4): 789-803. [Hu Zui, Deng Yunyuan, Liu Peilin, et al.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789-803.] DOI: 10.11821/dlxb202004009.

##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field transformation: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YANG Fuduan<sup>1</sup>, DOU Yindi<sup>1,2,3</sup>, LI Bohua<sup>1,2,3</sup>, LIU Xingyue<sup>1</sup>, LIU Peilin<sup>2,3,4</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2. Research Base for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engyang 421002, China; 3.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421002, China; 4.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shift of symbol consumption, the cultural spa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gradually facing the dilemma of alie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excellent cultural gene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have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core iss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ra.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and the dialectic of ternary space, combined with symbol consumption and field theory, we construc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ultural space architecture- evolution logic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path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Laoche village, Longsh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y deconstructing the production and evolution logic of 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village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field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symbol consumption, we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hidden spatial alienation problems and potential crises behind tourism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pos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path of the cultural space of Laoche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aterial cultural space: presenting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collage in which multicultures nest and coexist, and creating a symbolic material cultural space with bo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homogenization" and "different changes" of multiple actors; (2) Institutional cultural space: forming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 new system are mixed and juxtaposed, and the fundamental forc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he driving forces such as the Jabala Tourism Company, and the additional forces such as folk customs and customs have jointly shaped the contractual institutional cultural space around the tourism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3) Spiritual cultural space: three-dimens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solation at the psych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levels, multi-group common practice, multip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subject-object gaze interaction, etc., have resulted in the gradual delocalization of spiritual cultural space; (4) Cult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explicit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cultural space abnormality of Laoche village, the cultural space is reconstructed from the two level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der and reshaping the symbolic landscape. We aim to optim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n provide power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y.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ultural space production; conversion of tourism venues; symbol consumption; Laoche village